

文化屐痕

书与人

孙宜学 著



文化屐痕

书与人

孙宜学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履痕：书与人 / 孙宜学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7.5

ISBN 978 - 7 - 5426 - 5872 - 2

I. ①文…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0881 号

文化履痕：书与人

著 者 / 孙宜学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 - 22895557

印 刷 / 上海惠敦科技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390 千字

印 张 / 23.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872 - 2 / 1 · 1233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56475597

自序

我为什么写？

我不敢在“写”后加上“作”，因为“写”一旦与“作”合作，作者和读者都会就此产生无穷的联想，也会引起各种非议。奥威尔曾一本正经地回答过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或许从五六岁”，“就知道自己长大后应成为一名作家。”而我直到怀揣着写作梦考上大学中文系，都还不知道何为写作，写作何为。但因为我是全班唯一考上大学中文系的，当时曾引起过一阵轰动，或者说躁动，有那么几天，大家看我的眼神都透出一股热情，都以为我将来必定是位海明威、托尔斯泰式的人物。

的确，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因为曾经的精神枯竭和阅读饥渴所造成的心灵空虚，迫切需要一切能让人觉得美和纯洁的东西。经历了太多的虚假，我们以加倍的热情呼唤最普通的人性和人情，这是一种时代的饥渴，从一开始就带有一些虚幻色彩，但我们以为这是常态，所以一边自己享受着这种繁荣，一边想当然地以为人人都在享受这种繁荣。

我当时并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我报考中文系，唯一想到的，是可能会有读不完的书。我一出生，就能吃饱，但我从识字起，就没足够的书读。我为此焦躁过，在田野奔跑过，看着旭日和落日发呆过；也曾到处找报纸，甚至捡有字的纸片；到处打听谁手里有书，托人借来，有时借到“畅销书”，大家都得“车轮读”，甚至只有一晚上的阅读时间，那也得读，于是就在煤油灯下通宵无眠。记得有一次借到一本没有封面、页码都不全的《封神演义》，傍晚借到，第二天到学校就得还，这本书就是这样读完的。那是隆冬的一天，看书看到窗外泛白，在鸡叫声中抬头，双眼朦胧地望向窗外，片片雪花正在飘洒，就这样迎来了那一年的第一场雪。第二天早上上学路上，雪已把路边的沟掩住了，我因为眼

神模糊，加上意识不清，竟一脚踏进了雪坑，这才惊吓而醒。不过这倒保证了我一天上课未打瞌睡……

这种“饥饿阅读”带给我的痛感和美感，让我敬书，视写书为一项神圣的工作，我愿作书的奴仆，也因此，我从来都不敢想自己也要写书。

读了中文系，的确有了读不完的书，但当床头、书包里放满了书时，我对书的感觉，却似乎越来越淡然，甚至近于无情了。但动笔的欲望却逐渐强烈，这并非因为自己能写点什么，而是因为自己在读中文系，就以为理所当然应该写点什么，否则就难为情：纯粹是一种职业的暗示罢。

写吧！写吧！心中一个声音一直催促着我，却不让我想为什么写？写什么？为谁写？

我的写字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不知不觉，写字变成了我的生计，成了我的职业。不但自己写，竟还有了学生要跟着写，在帮学生确定写什么和为何写、为谁写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先形成一套让自己信服也能说服学生的理由。于是我开始整理自己的写字史，横看竖看，用在同济这所工科大学形成的越来越趋于简洁的思维方式，我发现自己的写字生涯，实际上只有六个字，即“写书、译书、编书”，也简称为“写、译、编”为文“三字经”。

1. 写（书）。

既然以文为生，就得辛勤耕耘，心勤手快，才有文字流出。有一字，才有一行字，才有一页字，这是基本条件。但“写”什么，却是原则问题了，我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的是：秉持自己的为人良心和学术良心，保证自己笔下流出的文字源自自己的内心，老老实实写出来，这就是好文字，好文章，好书。

好书和好文章都是不吐不快、非说不可的文字，绝非无病呻吟的功利之作；好书和好文章要能让读者读后有所感悟；好书和好文章不一定文字漂亮，因为源自内心的的文字都是最平易朴实的文字，因为人们用心思考时的文字，都是最简洁实用的，也最日常。

好书和好文章还应能解决问题，可以解决个人的精神困惑，也可以解决某个学术困惑，要能对本人的精神修养和学术研究有具体贡献；最好还能匡扶社会正义，助推社会正能量。

2. 译（书）。

人文学者必须要有世界眼光和世界气质。要求学者都学贯中西，的确太难，但人文学者至少要能在跨文化的视域内关照自己的文字。从另一个角度

讲,任何民族文学都具有世界性,至少都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所以,都迟早要走向世界,或接受世界上的其他文学的影响,或相互影响。所以,要写好文章,写好书,汲取异域人文营养是必要的知识储备,也是重要的参照。所以,我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至少要能通晓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外文作品和学术著作,同时要积极做些翻译工作,把一些好的外国著作翻译成汉语,以供更多的人了解,这也是人文学者的一种责任。

3. 编(书)。

编书是一种需要功夫的功夫,尤其是编好书。文如其人、腹有诗书气自华,等等说法,无非是说人要有智慧,有修养,就要多读书,读好书。就拿做学术研究来说,你写出来的文字是否厚重,必然取决于你知识的积累是否厚重,与你是否具有对所论话题的历史感密切相关。而要有这种历史厚重感,做到论由己出,言之有据,其中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充分掌握相关的资料。所以,学者的一个基本功,就是要能发现资料,并根据历史真实整理资料,进而在分析的基础上化解这些原始资料,融入自己的内心,形成自己的观点,化为自己的文字。所以,我称会编书是一种学术童子功,也是一种学术境界。

以心为源,以笔为媒,以文为心。写字的人,一生哪怕只能写、译、编出一篇文章、一本书,但只要你是老老实实地在用心写、译、编,就至少可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得起自己的学生了。

一个人文学者,若能做到“写、译、编”三功皆备,以我肤浅的认识,可说安顿了文人三窟,做人做事为文,就更得心应手了,甚至有时会有一种驭风而行的快感。即使身居陋室,亦可不改其乐耶。我和我的学生当然达不到这种为文的境界,但作为一种目标,我是时时要求着自己,也要求着自己的学生努力的。

毕竟,这“三字经”,实际上也是一位人文学者的基本功夫和基本功能,也是文人“胜业”的起点和基点。

2016年4月9日

CONTENTS**目****录**

自序 / 1

第一编 书与人

守望心灵的家园 / 3

良知的唱吟 / 5

遥想与近思 / 7

道德与理想 / 9

合唱与独唱 / 11

绝望与希望 / 13

失落与寻找 / 15

坚守与偏离 / 17

上海青年评论家的整体亮相 / 19

逼近世纪末的呐喊 / 20

广纳博收 锐意创新——刘以鬯及其意识流小说 / 23

幽燕老将 气韵沉雄——曾敏之及其文史小品文 / 27

王尔德的控诉状与自供状 / 31

这个叫马原的汉人 / 36

等待复兴的天才 / 39

我为什么要写《金庸传》 / 45

跨世纪的泰戈尔 / 48

文学的哲学 / 51

- 无墙的博物馆 / 53
文学与地图 / 58
百年一羽生 / 61
一所工科大学的“浪漫” / 63
中国大论坛 / 66
法国现代批评大师 / 69
天真汉爱默生 / 79
莫洛亚的精神行旅 / 88
战争中的人与“动物” / 90
乔治·摩尔的“谈话录” / 94
十九世纪绘画艺术 / 95
白璧德：卢梭的天敌 / 97
英国式幽默 / 102
一个青年的自白 / 105
暴风雨中的百合 / 107
王尔德的天堂与地狱 / 122
雪泥上的鳞爪——中外文学论 / 125
“家庭书架” / 128
西方文化的异类 / 131
凋谢的百合 / 140
演员的准备 / 143
人性的本质 / 145
孔子与莱布尼兹 / 147
性格与文化——论东方与西方 / 149
泰戈尔：中国之旅 / 153
烈焰中炫羽的孔雀 / 155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Needs Tending / 158
安然若素任风雨 / 161
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与西方 / 164
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 167
泰戈尔在中国 / 169

- 向世界讲中国故事 / 171
构筑海外中国文化传播的“硬基础” / 173
谈冯唐译《飞鸟集》 / 175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传什么”与“怎么传” / 177
一桩没有凶手的谋杀案 / 183

第二编 中外文学论

- 尤金·奥尼尔剧作中占有欲女性形象 / 189
《榆树下的欲望》悲剧人物新探 / 200
奥尼尔剧作悲剧主题的文化透视 / 208
论奥尼尔剧作的死亡悲剧意识 / 220
《沉沦》和《城堡》主人公变态人格差异性比较 / 230
春柳派悲剧与日本新派剧 / 237
《镜花缘》的风趣 / 247
美的冲撞与融合：王尔德与“五四”时期的中国 / 257
论社团研究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 266
《兄弟》：悲悯叙述中的人性浮沉 / 273
从《兄弟》看余华人物塑造艺术的新突破 / 282
“婆须蜜多”：苏曼殊的涅槃情结 / 290
泰戈尔与上海 / 300
中外文学关系原始图景的一次还原与延伸 / 306
非现实性人物：论《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哲理主题 / 313
梁启超的浪漫启蒙精神与西方滋养 / 320
郁达夫“沉沦”情结中的异域因子 / 330
郁达夫的中国式“感伤”与德国式“忧郁” / 342
中国的雪莱观与雪莱的中国观 / 352
- 后记 / 367

第一编
书与人

守望心灵的家园

山东作家张炜在漫长的写作生活中,常常一个人面对窗外的茫茫景物,或闹市车流,或寂静雪地,于是便产生一些悟想和激动。这些更像是一种“自言自语”或“自吟自赏”地从内心流淌出的文字,就成了我们面前这本《纯美的注视》(“火凤凰文库”第14种,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在这部时间跨度从1982年至今的散文随笔集里,张炜不管是倾诉自己在创作时心灵与天籁、大地的交融无间,还是谈王安忆、刘玉堂、王延辉其人其作品,还是夜谈鲁迅所感悟到的人格的伟大,无不凸现出一个坚守家园的战士的执着。在呼啸而至的商品大潮里,在逃避崇高,到处充斥着轻浮、廉价的伤感的媚俗世风中;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告别人文理想,随波逐流,向金钱和虚伪出卖缪斯的贞操时,张炜却呼喊出另一种声音,一种坚守理想、信仰,坚守真善美,坚守人性原则、人格力量的声音。他坚信,尽管通俗化的浪潮会轻而易举地覆盖一切,一个真正的有良知的艺术家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勇敢地为弱者、为人民讲话,用艺术之神的纯洁和高贵,固守着脚下这块真实、诚恳、朴素、坚定的大地,维护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源。

张炜清醒地看到,在当前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对于一片土地的守望,对于一种理念的守望”是越来越艰难,但也因此越来越有意义。他始终相信艺术是人生命的内在一部分,是“人生中最伟大、最可爱、最不可离开的事业之一”,唯有艺术才能塑造出一个健康真实的生命。为了维护作为自己生命的艺术,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举起手中的投枪,在沉默与固守中反抗一切的妥协。

在各种欲望把人性压榨到几近虚无的时代,张炜却满怀激情地预言:一

个新的文学时代来临了！因为这是一个唯有依仗心灵的时代。

在一个贬损良知的时代，张炜的声音不管显得多么微弱，但却能使人生出无穷的欢悦和向往，因为：在恍惚和盲目的潮流里，人的心性仍在追寻原则。

——原载香港《大公报》，1997年2月1日

良知的唱吟

与整个时代的潮流相一致,眼下内地的图书策划、出版也成了一种商业性行为,因而进书店也有一种逛商场的感觉,一本本、一套套装帧精美的图书令人眼花缭乱,但认真看看,不禁有些失望,因为许多看似豪华的书实际上不过是绣花枕头。令人欣慰的是,在图书出版的滚滚浊浪中,也流淌着不少清流,一些优秀的图书仍能坚持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呼唤并支撑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元气。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智者心语丛书”就是其中一例。

这套丛书包括:陈思和的《写在子夜》、张汝伦的《坚持理想》、李锐的《拒绝合唱》、王彬彬的《死在路上》、谢泳的《旧人旧事》、张新颖的《歧路荒草》,其作者都是近年来在批评界和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学者。尽管他们立身的岗位不同,但都感受到了当代社会的重压,感受到人类道德与理想的失落,因而试图通过对历史与现实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的探求与批评,重新找到知识分子实现人文理想与社会责任的价值规范,为我们这个越来越苍白的时代注入一种鲜活的精神力量。陈思和多年来一直关注着百年来中国新文化传统发展中的种种现象,他的《写在子夜》,即是通过追思几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历程、心灵历程及学术历程,力图找到知识分子参与建构社会正义网络和个人尊严与自由观念的切入口;张汝伦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是从哲学高度,对当代人摈弃道德、正义、理想的深层心理结构予以痛心、犀利的揭露;其他四位作者的文章,也都贯注着这样一种当代知识分子诤言社会弊端、呼唤人类良知的书生之气。他们的坦诚与执着,在当下这个充斥着世俗喧嚣的时代,尤其令人感动与兴奋,而他们发自灵魂的呼唤,则使人体验到一种心灵的愉悦和对人类理想的向往。

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或看破红尘、或投身商海，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类理想的责任的时尚里，这里的六位知识分子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是上面这几句话所能概括得了的。

——原载香港《大公报》，1997年4月18日

遥想与近思

1995年下半年至1996年初,陈思和在日本度过了半年相对安静的生活。面对窗外被电光映衬得月色苍白的天空,他遥想历史,近思现实,写下了一组读书札记,便有了我们面前这部《写在子夜》(“智者心语丛书”第一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陈思和的编年体文集迄今已出版了六本。前五本都是以生肖题作书名,唯这一本避开了“鼠年”而取“子夜”,就有了一点讽刺的味道。这本“写在子夜”的书延续了陈思和以往的学术思路与风格,纵横捭阖,任意而谈。话题涉及了百年来中国新文化传统发展中的种种现象,在审观历史中及时提出对当代文化建构的看法。透过这些源于心性的文字,我们不难触摸到一个把生命投入思考历史与现实的知识者,试图通过追思几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历程、心灵历程及学术历程,寻找知识分子参与建构社会公正理念和个人尊严立足点的良苦用心。

陈思和自称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批评家,他总是把自己丰沛的生命激情和对人性、良知的热切渴望灌注于他的批评对象,既敢于直面人性深处的卑琐,又不吝对种种新出现的、合乎人文理想的文化、文学现象表达出由衷的欣喜和褒赏。其文宽厚而犀利,既有求真驳伪的忠实,又有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张扬。不但使人读之受到警醒与启迪,而且还会体味到心灵相契合的愉悦,如他把红卫兵运动看作是政治权力与青少年内心对功名渴望和兽性发泄相结合的产物,就十分令人震动。

追溯历史是为了现实关怀,剥落人性的丑恶是为了回复正义的良知。陈思和在梳理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流程中,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知识分子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即在庙堂、广场、民间三种

价值取向中做出选择。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与其在庙堂或广场高谈阔论，还不如选择一项自己能够做得好的“胜业”，这是知识分子摆脱主流话语的羁绊，回归真正的自由并参与社会进程的基础。

我想，在一个正常、理性的时代，陈思和在他选择的道路上是不应该孤独的。

——原载香港《大公报》，1997年4月20日；《中华读书报》，1997年12月7日